

# 目 录

## 小说·文学(2001—2012)

挑战与和解·····	(3)
文学的悖论·····	(27)
关于小说鉴赏·····	(42)
在诗琳通公主获奖会上的讲话·····	(54)
对于价值的尊重·····	(55)
文学人生互证论·····	(59)
想起了詹姆斯·乔伊斯·····	(81)
文学的方式·····	(83)
历史、国情与文学·····	(105)
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108)
文学与我们·····	(130)
我们的精神家园·····	(143)
可能性与小说的追求·····	(150)
汉语写作与当代文学·····	(166)
汉语的功能和陷阱·····	(178)
文学与人·····	(189)
文学的期待·····	(212)
文学的挑战与和解·····	(229)

我看儿童文学 .....	(244)
想象与文学 .....	(250)
文学与生活 .....	(270)
文学的说法 .....	(284)
小说漫谈 .....	(304)
小说的可能性 .....	(312)
文艺与异端 .....	(332)
文学十讲 .....	(351)
文学的启迪 .....	(408)
在纪念萧平创作五十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 .....	(425)
漫话小说 .....	(429)
文学的方式 .....	(453)
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关话题 .....	(471)
泛漫与经典：当前文艺生活一瞥 .....	(496)
从莫言获奖说起 .....	(515)

# 小说·文学

(2001—2012)



## 挑战与和解\*

各位好,有机会在这崭新的现代文学馆和各位交谈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我今天实际是一个漫谈的形式,我是想和各位共同探讨文学,特别是其中的小说,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果实,也作为一种思维和表达的方式,有一些什么特点。

和自然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法律等等各种人类文化的结晶相比,文学显得挺不同。比如说,它的生命力比较长久。自然科学或其他的人文科学,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进化的轨迹,从比较原始的,很多带着假想,带着迷信甚至巫术和邪教的影响的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到开始构建一种科学的和实证的世界观,到牛顿的力学,然后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拿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医学来说,从放血、刮痧、拔罐子,这些也都很好了,然后有草药,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药品、制剂,然后有抗生素等,它有一个进步的轨迹。新的技术往往能代替一些旧的技术,新的理论往往可以代替原有的理论。可是,文学就很难代替,而且你也很难说进步不进步,文学思潮可以不断地进步,作家的思想可以不断地进步。但是,一部文学史你很难说成是一部进步的文学史。

《诗经》是落后的? 现在出一本二〇〇一年诗集,就是最进步

---

\* 本文是作者在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的？天知道！小说也是越来越进步的？新新人类的小说是最进步的？汉魏六朝的那些笔记小说是落后的？或者唐宋传奇是落后的？还是《红楼梦》是落后的？很难说。我们现在还可以阅读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于千百年前的小说著作。当然具体的风俗习惯有很多变化，但是它最基本的情节，它的人物的那些悲欢离合，仍然能够引起我们的一种关切，仍然能够使我们怦然心动，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活在我们当中。在《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她永远就是那么十四五岁，她永远不会老。你想象不出林黛玉老了，现在有二百多岁了，你不会这样想。贾宝玉也永远就是十五六岁的那么一个小公子，挺漂亮的，多情，也很聪明。我们几乎也想不出来，清朝还有哪套书能够跟《红楼梦》相比，仍然被这么多人热情地在那儿阅读着，尽管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策论，会有很多书，有些书也很有价值。在中国，能够和长久流传的文学作品相比的，唯有古代的哲学家的有些著作，也就是《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这个可以，现在还有人看。但是我有一个怪论：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作品至今还有魅力呢？因为他们是非常文学地写出来的，不是用那种逻辑的、实证的语言写出来的，你可以把它当文学书来阅读，不是寓言，就是故事，在文字上讲究，音韵上讲究，有的甚至像谜语，你可以猜来猜去，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那么解释。我们可以把它当文学的书来阅读，就是说，文学性给了中国先哲们的著作以更长久的生命力。

外国也是这样，比如说《圣经》和《古兰经》都很好读，佛经应该也很好读，因为它们都有很高的文学性。你即使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宗教信徒，也可以把它们当文学书来阅读。

不同的人都可以喜爱、或者使用、或者援引同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对一个作品进行探讨，而且都言之凿凿，都非常有根据。很多人肯定文学的作用，可是角度各不相同。对小说的作用最夸张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说：欲兴一国之政治，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社会，先兴一国之小说；欲兴一国之经济，先兴一国之

之小说；欲兴一国之风俗，先兴一国之小说。总而言之，你要改革中国，你想期待一个新中国的出现，你就必须有新的小说。他这也有理呀。因为小说表达了人们的理想，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期待。这也不能说完全是梁启超的发明，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所谓乌托邦主义的作品，《理想国》也好，《新大西岛》也好，实际上是把自已的社会理想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还有的小说从一种积极的政治的角度讲是非常好的。比如说高尔基写了《母亲》，直接描写沙皇俄国时期的工人的斗争。但据说普列汉诺夫认为高尔基的《母亲》写得不算很成功，艺术性不是很强。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只是普列汉诺夫，包括我接触过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高级的领导人也有这个观点。胡乔木就曾经跟我讲，《母亲》写得不好，他说高尔基写得好的，还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但是列宁就认为《母亲》写得非常好，合乎时宜，正是当时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需要。这种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谈文学的观点，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过，我当时听了真是佩服极了。他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怎么起来的？就是由于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林琴南把它翻译成《黑奴吁天录》的；法国大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就是由于《马赛曲》，当时都已经打不过去了，革命者就要失败了，完蛋了，这时候唱起《马赛曲》，就热血沸腾，一下子把反革命摧枯拉朽，胜利了。我也不知道他讲得对不对，但是我从小就觉得文学了不得了，简直就是神功了，对人精神上的作用太大了。

还可以从更具体的角度来肯定文学。河北省开三级干部会就印发了陆文夫的小说《围墙》，认为陆文夫的小说里写了两种干部，一种干部是光说不练，一种干部是埋头苦干。“实干兴邦，清谈误国”，中国就是需要实干的干部，所以把这个发给大家了。据说刘伯承很喜欢读小说《日日夜夜》，因为《日日夜夜》里面有对巷战的描写和对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战役的描写。我还记得它里面有一个对巷战的描写，红军从一个窗户冲到一座盘踞着法西斯德军的

楼房里,他人还没站稳呢,先拿机枪“哗哗哗”扫射。他来不及看,因为等看清楚了,人家早把你毙掉了。据说刘伯承很欣赏这一点,他从战术的角度,觉得《日日夜夜》写得很好。

斯大林肯定考涅楚克写的《前线》,因为《前线》里面描写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将军,不懂得接受新的事物,是个老粗、苏联老红军。另外还写了一个专门假报成绩的记者客里空,非常有现实意义。此外好像还有人研究过《红楼梦》里头那道菜,叫“茄鲞”。说那个“茄鲞”就是研究王熙凤跟刘姥姥讲的那个菜谱。但是最后做起来很难吃。还有人很认真,把《三国演义》里头的“木牛流马”按书上的尺寸做出来,结果马也不是牛也不是,根本不可能起到书上写的那些作用。现在的人分析说,“木牛流马”就是一种独轮手推车,能够在山区使用。但按那个尺寸做出来,连独轮手推车的作用也起不到。

与此同时,这文学又老有点像个异端,在社会上老处在一个可疑兮兮的地位。这在中国更有传统,比如说林黛玉一次说话引用了《牡丹亭》里面的一句话,薛宝钗就对她进行个别帮助,“颦儿,过来,刚才你说什么了?你的话是哪儿来的?”林黛玉脸就红了。薛宝钗又说:“我们女孩儿怎么能读这些呢?我小时候,也爱读这个,当时家里面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不能读这些东西,读了这些东西会移了性情,移了性情,就麻烦了,不要读这些!”薛宝钗的这种观点在我们中国有源远流长和广泛流传的基础。

七十年代“一打三反”的时候,我还在新疆的农村里,来了一个宣传队,在农民里抓反革命。因为我懂维吾尔语,宣传队的组长说,你们还是可以利用的,我说“好好,欢迎利用”,他就让我给他们当翻译。村里有一个小伙子,他有很多小说,都是苏联塔什干出版的,有高尔基的《在人间》,还有《纳瓦依》,都是在中亚最有名的作品,宣传队把他的这些书全收缴了。收缴以后,我们大队的书记,就找这个小伙子谈话,亲切而又严肃地说:“兄弟,不要看这些书了,这些书看完以后,思想出了问题,你就麻烦了。你当了现行反革命,你自己都不

知道。”

我们中国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认为文学风花雪月,雕虫小技,好像小说这东西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台面。中国古代对诗和散文还比较重视,小说就是引车卖浆者流了,甚至“诲淫诲盗”,所以总是对它有一种戒心。文学令人产生戒心。这样一些现象值得我们分析一下,文学特别是小说,受到读者那么多的喜爱,为什么又有众说纷纭的一些说法,甚至还引起了一种戒心。

那么,我们就谈一下文学特别是小说所具有的挑战性。这个挑战性不是指政治、社会的方面,而主要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考虑,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挑战性。

头一条就是独创性。独创就是挑战,世界上的事,你若想有个发明创造,就是挑战,对已有的模式,对已有成果的一种挑战。当然是挑战,原来谁发烧都喝柠檬茶,后来又发明了消炎片、磺胺制剂,到时给吃消炎片吧,这当然是挑战。原来最快的车是马车,真漂亮,我在波兰参观过一个马车博物馆,那真是太漂亮了。后来有了汽车,有了火车,这都是挑战。中国清朝开始修铁路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很害怕,还有反对的,还有不准开的。据说第一列火车开了一会儿就不让开了,然后用牛去拉。这种故事在英国也有,英国的第一列火车造出来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好像它是怪物一样。其实干什么都需要独创,但是那种独创性不像写小说这么明显。比如说洗脸的香皂,我们也希望它有独创性。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四合一”是最好的香皂。后来,我收入也高了点,我指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前,也出入一些大场面,比如说到中南海去听苏联演员唱歌,我就发现有比“四合一”更好的香皂,就是檀香皂,前几年没完没了做广告的是“力士”。但是这香皂不管怎么变化,你选择了这种香皂,基本上可以代替那种香皂。你喜欢“力士”,你就用“力士”。你不需要用“力士”洗这个手指头,用“檀香皂”洗那个手指头,用“舒肤佳”洗那个手指头,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到安定医院去吃点药。

可小说不是这样,你可以说我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但是说我既然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就不需要看王蒙的小说了,那你吃了大亏了。互相不能代替,谁也不能代替,你写得再好,也代替不了我。作家都在那儿想尽了办法,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特立独行。这种独创性,是一种个人的独创性,一个产品出现了一个新的牌子,也是一种独创。但是这种独创,它不一定是个人的,它是这公司的,你弄不清是多少人在这里边劳动。比如诺基亚 8810,它是集体创造的。但是文学,特别是小说,它非常强调个人,这种个人的独创性有时候会引起人的不安,甚至会引起社会的不安,这种独创里面就包含了某种超前,既可能是超前的,又可能是个骗局。不要认为打着独创旗号的都是好东西,它可能是骗局,这样的争论全世界至今没有停止。

比如说,现代派的艺术作品,是独创,还是骗局?有人说是骗局,后现代就更是骗局。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独创,这种独创的挑战性可以挑战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当年法国上演左拉的戏剧的时候,剧场门口有盛大的游行示威,抗议这种不成体统的作品搬上舞台。就是说,一种文学样式或者一种文学上的探索能够使社会不安到那种程度,它和这个社会可以抗拒到那种程度。

去年九月,我到爱尔兰参观。爱尔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它的文学太棒了,爱尔兰人又会说话又会作文,萧伯纳、王尔德、叶芝都是爱尔兰人。我还看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写的《尤利西斯》,他有一段有意思的话,这段话印在一个文化衫上。我非常懊悔,没有买这个文化衫,不是因为钱的关系,我是怕太欣赏那段话,引起别人对我的攻击。他说我对待这个社会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逃脱 *escape*,第二个办法是沉默 *silent*,第三个办法是搞点阴谋诡计 *cunny*。这个词你要翻译成阴谋诡计当然是坏的,但它也可以翻译成巧妙、机巧、巧妙对应。它在英语里,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尤利西斯》发表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好评,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瞎闹的东西,至今西方国家也仍然有一派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个骗局(认为毕

加索是骗局的也有),没有任何了不起,这本书就是故弄玄虚,就是折腾你。我无权对这本书本身说话,因为你真要对这本书说话,不但要看这本书,而且要从原文看。这种屡见不鲜的对某个著名艺术作品是“骗局”的指责,正是对于独创的挑战的一种反面的回应。

第二点,小说的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它具有整体性,它给你的不是一个结论、一个命题,更不是一个口号、一个呼吁:“同志们冲啊!”它是整体的,它是把一群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它的多种多样、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种种现象,都给了你。好的和坏的,美的和丑的,可以理解的和匪夷所思的,全都给了你。这种整体性,有时候你抓不着它,有时候你老是琢磨不透。比如说肖洛霍夫,他是苏共中央委员,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的时候,苏联的政府代表团的成员里面就有他。肖洛霍夫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曾经慷慨豪迈地说,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们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一群蠢人。他们哪儿了解苏联作家的心情,我们写作是按照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心是属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讲得真棒呀!我要是赫鲁晓夫,我听了我也乐死了。

最近我看到苏联文学专家蓝英年的一篇文章,分析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他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不是对农业集体化的颂歌,相反,仔细看《被开垦的处女地》,越看越像是暴露农业集体化的黑暗,一塌糊涂,宰杀牲畜呀,恐怖呀,以至于到了农民要武装暴动的程度,因为一些干部胡来呀!里边有一个老粗整天鼓吹世界革命,他老是执行极左路线,但是他又被一个富农女人给迷住了。这位拉古尔洛夫别的事我已经全忘了,我只记住他的一句名言“女人是人民的鸦片烟”。知道蓝英年持此说以后,再看《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真看不出来,肖洛霍夫这个老狐狸一边向赫鲁晓夫表示效忠,一边黑暗还真揭露,揭露得叫你头皮发麻。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它里面有互相矛盾的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当你描绘我在这儿讲演的情形时,就一定不会忽略茶缸子盖掉在地上

的这个细节。如果你是一个整理文集的人,你就完全不必要在文章的此处画一个括号“此时茶缸子盖掉在地上了”,这样就扰乱了读者,你不需要这个整体性。很多学问都不需要这个整体性。

力学定律讲的就是力学定律,医学临床治疗的丛书讲的就是临床治疗,阑尾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什么地方,那时候你旁边有没有茶缸子,天上打雷还是下雨,或是你跟你爱人是要离婚还是要做爱,这跟你要做阑尾的手术毫无关系。那些东西都不需要,都可以过滤掉。医生可以告诉你的就是阑尾在什么地方,你这一刀应该怎么下去,事先当然还要消毒,还要麻醉。

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说,他有一种最可贵的感觉,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一切的体验都是有用的。你今天挺倒霉,所谓喝凉水都塞牙,你过了这么一天,很可能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小说细节。说不定比你这一天处处顺利、春风得意那个小说写出来还好。这种整体性,它和其他的学问不一样。作家有时候让人挺烦的就在这儿,因为其他的学问要求的都是明快,比如说法律,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不禁止的,非常清楚。你做了违法的事,是判一年、判两年,还是枪决,这要求得非常清晰。炒菜、烹调要求也非常清晰,虽然一般中国人的脑子都没有那种清晰的感觉。我是看完了炒菜的书,就绝对不会炒菜了,白糖十五克,红糖一点五克,酱油二十五克,你要看了这个绝对不会炒菜了,但是人家的表述是绝对清晰的,是我们的脑子不清晰,所以你接受不了。开汽车更清晰,靠右行就是靠右行,绝不能说或者靠左行;从左面超车就是从左面超车,绝不能从右面超车。

可是文学它是一个整体,就出现了一种不确定性,好像立场不太鲜明,你到底是要干吗呀?你到底说是它好,还是说它不好呀?也有文学作品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抗日,那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抗日。比如说抗美援朝,也是非常清晰的。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由于它的整体性,而出现了某种不确定性或者多义性,从而对社会的已经为大家公认了的原则形成了一种变相的有意

的或者无意的挑战。解放以后我们进行过一些非常繁琐的讨论,这些讨论现在看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当时为这些讨论,不但是掉了细胞,还有人要掉脑袋了呀。比如说我们讨论写英雄能不能写缺点,写英雄能不能写英雄死;写敌人能不能写优点,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敌人出来以后你弄不清那脸上是抹了黄酱了,还是抹了什么了,反正鼻子、眼睛没有一样长得是地方的。如果一个敌人出来长得挺漂亮的,你这就是立场问题。可坏人里头长得漂亮的可有的是呀,汪精卫长得就很好呀!所以这种整体性,有时候看完以后甚至让你感到一种惶惑。

小的时候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十几岁就在党的教育下,十四岁就入党了。所以我教育我的孙子,我在孙子十四岁的时候说:“你呀,光知道玩,什么电脑游戏呀,什么日本卡通人,脑袋里全是这个。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读过《社会发展史纲》,读过《新民主主义论》,都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了。”结果我这孙子跟我说:“那你不入党你干什么去?那时候你也没有玩具可玩。”当然他要贬低我的革命经历了,可是他也有一点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当一个社会造成了普遍精神的匮乏,当一个社会不能够给儿童提供他们应该拥有的精神生活,包括玩具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要垮台。也可能我是偏爱我自己的孙子的关系,听了以后我不完全否定他的说法,当然将来还需要对他长期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

我积极追求革命的时候,我革命革到什么程度吧,我看鲁迅的书,都觉得不过瘾了,因为他不直接描写共产党。我只有看到什么才感觉到带劲呢?看到革命烈士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那时候不叫“受苦的人”,翻译成“罪人”),然后一排枪过去了,然后喊了一声“共产主义万岁”!我看到那儿,觉得这才叫小说,这才是我所要求的小说!还有一本在苏联很有名的小说,就是《士敏土》,革拉特考夫写的《士敏土》。它写的苏联战后恢复经济时期,《士敏土》就是洋灰。我看完以后,我傻了,怎么这个革

命,革完了命那么混乱呢?简直是乱成一团了。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描写苏联的清党,当场宣布开除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党籍,那个人立刻就拔出枪来,照着自己的胸口,“啪”就是一枪,主持开会的人眉毛一动都不动,继续开会。这么坚强!第一我很佩服,这个共产党真是棒,真是厉害,真坚强!第二我也害怕,我也肝儿颤呀!革命都革成这样了,怎么办呀?然后里边那个区委书记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这不跟强奸一样?这怎么行呀?写一个富农被驱逐到北海地区,那里是苏联的高寒地区。里边有很多这一类的描写,我真是心惊肉跳。

所以说这种作品,你看完以后的感觉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矛盾的,是充满了热情的,是有自己的倾向的。这个革拉特考夫也是在苏联文学史上包括被苏共当局所肯定的,认为他是反映了重建苏联的那种英雄主义的热情。但是同时,他又带给你无尽的惶恐,那个清党的时候当场自杀、脸皮连眉毛一动都不动的场面,我一想起来就有点紧张,直到今天还紧张。这是说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整体性。

很多小说,很多文学作品,它还有一种批判性,我不是指那种政治社会的批判性。小说和新闻的不同,就在于它可以写实际上没有的东西,它可以写你的理想,写你的幻想。因此它就形成了一个反差,小说里的东西和现实里的东西形成一种反差,这种反差本身带有批判性。我们拿一个和政治无关的题目来说,比如爱情,最美的爱情几乎都在小说里面。如果你不看小说,将来搞恋爱的时候可能连情书都不会写,而如果写不好情书,你在初次的爱情上会丢很多分,你会失败的。可是如果你看得太多了也麻烦。你要按小说的标准来择偶来建立自己的婚姻的话,你的婚姻很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小说是浪漫化的。好几个朋友跟我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自杀了,所以他们的爱情就是最伟大的。如果他们没误解,到最后两人结婚了,也没有计划生育,一下子生了八个孩子。罗密欧老了,朱丽叶也老了,脸上都有褶子了,到晚上的时候朱丽叶给罗密欧打盆洗脚水:“洗洗脚丫

子吧,你的脚太脏啦。”完了,这爱情故事全完了,不那么伟大了。

为什么爱情的故事那么多,爱情的小说那么多呢?就因为现实中十全十美的、浪漫的、青春永驻的、如诗如歌如画的爱情太少了。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有特别现实的一面,爱情再伟大,你得吃饭,老饿着肚子,那是很麻烦的事,吃饭就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你要结婚了的话,不但要吃饭,还得睡觉呀,睡觉就有几个条件。所以这种理想性、这种浪漫性往往就造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批评、批判乃至否定。所以我们有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很不好的。为什么爱好文学?在一个单位里你要爱好文学,人们就认为他就具有以下个人特点:第一,自认清高;第二,不安心本职工作;第三,跟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关系不好,而且还有花花哨哨的各种传闻;第四,看不起领导,对本单位的组长、科长、处长都不老老实实汇报。这些青年如果有上述特点,提职、分房子一点份都没有,要是搞运动戴帽子倒都有份。

文学往往对既成规范形成一种有意无意的挑战。比如说,道德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写小说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严格地遵守道德的戒律,有时候对某些道德的戒律还产生困惑。

据我所知,很多国家都希望家庭相对稳定,这对社会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所以都是谴责、批评至少是不提倡外遇和第三者插足的。不要以为美国是一个多么随便的国家,不是那样的,那是好莱坞的某些电影要你玩的。你以为他很方便就拉一个人,互相有好感后,搂着就进旅馆?没那事儿,这种机会一百年也不见得有一次。美国有很多电影恰恰是反映因为外遇而导致家庭破裂,尝到了恶果。可是我们的小说里就没完没了地写这个三角啊四角啊。你写一个小说,男主人公是道德的模范,女主人公是模范的道德,两人从十四岁青梅竹马,十六岁开始恋爱,十八岁开始互相交换信件,然后男二十八,女二十五,符合国家提倡晚婚的标准结婚。三年以后生一个孩子,你忠实我、我忠实你,见了别的异性肯定不侧眼珠,这倒也挺好。

如果一个小说里,爱情的种子,到处在发芽,爱情的花朵到处在开放,一抬头,一斜目,听见了门铃声,都是爱情在向你召唤,这可不安全。第一,不道德。当然必须承认有很坏很坏的书,里面不但有骗局还有垃圾,而且有毒品。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二,你又不要轻易地说它是一个毒品,因为这个东西,自古以来争执不休。

《金瓶梅》它是个什么东西?最近我看的一本书里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这个《金瓶梅》在文学上还是有成就的。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后来的《红楼梦》。当然这个话并不是毛泽东发表的,还有很多人也持这种观点,《金瓶梅》也不能完全否定。《红楼梦》原来也是禁书。什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什么《十日谈》,外国的东西更多,一个色情,一个暴力,都是我们所反对的,但它又是许许多多文学作品里面不可缺少的元素,绝对的没有是不可能的。《红楼梦》里没有吗?曹禺的《日出》里没有吗?当然他是批判的,他不是欣赏的,不是宣扬的。《日出》刚开始演出的时候,什么金八呀,翠喜呀,还有翠喜的那段话,我身边的一些共青团的工作者看了,吓得脸都变色了:怎么这么演话剧呀?这么演话剧对青年人得有什么影响啊?

因为文学家是深刻的人文主义者,他只能围绕着人,人的思想、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也包括人的欲望来写作。他必须承认人的欲望,食色性也,他都得承认。甚至于某种暴力倾向,或者千百个暴力危机,人有没有呢?人性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呢?诲淫诲盗这绝对是不能取的,是我们所反对的。但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它接触到人的欲望,接触到某些人的性的心理,包括接触到某些人的潜在的或者暴露的那种暴力的经验、那种体验乃至那种需求,就很难避免。

我上面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文学本身的感受、思索和表达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法律、政治的方式不完全一样。政治也挺复杂,但是政治相对的要求鲜明。毛主席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敌友

要清晰,你不能敌友不清晰。你要用这种方式写小说也行,也能写出好的小说来,但不可能所有的小说都这样写。具体地运用到小说里,我这个小说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主要问题大家弄清楚了,这四个是好人,那两个是坏人。但是你老这么写大家就会不满意,读者还需要自己解读,自己分析。作家的那种理想性的、批判性的、孜孜不倦地追求个人独创的心情,他的从整体上、从相互矛盾、相互冲撞的全局对生活的把握,还有他对以人为本的关注、对人的各个方面的关注,都对社会上既成规范、学术领域的既成规范、科学乃至道德领域的既成规范,形成挑战。

下边我再讲一讲文学的和解。是不是就一味地挑战呢?老挑战也很麻烦的,整天挑战,看一篇小说就挑战一回,一天看三篇小说就挑战三次,这也挑战得乏了。一鼓二衰三竭,你要这么看一辈子小说,你甭说挑战了,你站都站不起来了。所以说,小说恰恰是实现精神和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为什么呢?第一,它是虚拟的,它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既带有宣泄的作用又带有补偿的作用。文学,特别是小说,它使在现实当中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的事情,可以在纸上,或者在网络上实现,就跟真的现实一样,很有魅力,非常动人。

比如说,世界上有许多爱情小说,作家本身并非情场上的猎手或者圣手或者老手,很多人恰恰是在情场上失意得不得了,老单身汉、老光棍、老处女,他们的爱情小说写得更棒。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对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很满足,和自己所爱的对象热烈地拥抱、亲吻、抚摸,他的爱情小说绝对写不好。那些爱情小说写得好的,你们可千万别以为他们的爱情有多好。还有,爱情是浪漫的,是自由的,是诗化的,可是爱情的操作又是很具体的。在座的哪一位,在你的合法配偶之外再搞两个试试,光技术性的困难就会把你吓回去。马季有一句名言,你要想一个礼拜不踏实,你就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一个礼拜以前你就琢磨着请谁来不请谁来,几点钟合适,咱们吃面条、吃饺